

2016年4月24日是首个“中国航天日”。将航天日定在这一天,是因为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悠悠飞天梦,拳拳赤子心,那段特殊的岁月里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挖掘,去重温。

“小弟弟”找“老大哥”学放卫星

■李鸣生

【尽管中国专家们见到的只是火箭的一个脑袋,但毕竟是第一次见到了苏联的火箭,所以非常兴奋,看着看着,双脚便情不自禁朝着火箭的身边移了过去。】

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图-104国际航班起飞的时间,是早上8点。此时秋色正浓,暑气已消,有风有云,还有偶尔划过天空的几声鸟鸣。但就是没有雨,没有太阳。

20世纪50年代的莫斯科,是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麦加”,更是中国膜拜的圣地。于是历史选择了1958年10月16日这一天,由中国专家赵九章、卫一清、杨嘉墀、钱骥和翻译杨树智五人组成代表团,专程飞往莫斯科,向“老大哥”学习怎样放卫星。行前,因担心“老大哥”会留上一手,不肯传授“小弟弟”放卫星的秘诀,聪明的“小弟弟”便选了一个再中肯不过的名义——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而代表团的团长,便是赵九章。

莫斯科的秋天,与中国火一般的“大跃进”气氛相比,至少凉了十倍。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莫斯科后,在苏联专家的陪同下,几辆黑色的小轿车载着他们很快驶向了高尔基大街。片刻,小车停靠在了位于高尔基大街中部的北京饭店门前。中国代表团刚刚住进房间,屁股还未落座,便迫不及待地向了苏方负责人安德烈一句:“何时可以参观卫星?”安德烈很有分寸地笑了笑,然后安慰似地说:“考察和参观的日程我方已有安排,明天大家就可以开始参观了。”

当晚,中国专家们难以入眠。大家很想睡,却睡不着,一直躺在床上“烙烧饼”。后来干脆披衣下床,一起聚在阳台上。莫斯科秋天的深夜,寒气袭人,也不见月亮,只有几颗星星挂在天上。饭店很静,高尔基大街也很静。五位专家靠在阳台上,本想说点什么,又怕打破了这异国的宁静,结果还是什么也没说,只是各自望着苏联的天空,心里想着中国的卫星。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屋睡去。

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参观了苏联天文台;第二天,参观了空间电子所;第三天,参观的是老鼠试验生物舱。此后一个多月,还先后参观和考察了莫斯科

科展览馆、科技展览中心以及苏联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所等单位;同时也看了磁强计、质谱计等空间物理探测仪和振动、冲击、加热等空间环境试验设备。非常遗憾的是,因“保密的原因”,许多核心内容和场所并未让中国代表团看。

平心而论,苏联对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考察,尽到了一个“老大哥”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用专家杨嘉墀后来的话说,该看的都让看了。但作为1958年的中国代表团,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在所难免。于是赵九章在一次晚饭后散步中对安德烈说:“安德烈先生,在这两个月的学习考察中,我们从贵国学到了不少宝贵的成功经验,我们深表谢意!不过,你们能否尽快安排我们看看卫星设计研究院和卫星发射场,以便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回国后好让我们的人造卫星也尽快上马。”安德烈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要求我还得请示上级有关部门,等有了明确指示,我再作安排。”

两天后,中国代表团果然有了新的安排。这天上午,中国代表团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苏联中央气象局火箭大厅。大厅中央的一个平台上,躺着一枚探空火箭的头部,直径大约一米左右。五位中国专家被指定站在距火箭三米远的地方,听苏联一位专家介绍火箭的有关情况。尽管中国专家们见到的只是火箭的一个脑袋,但毕竟是第一次见到了苏联的火箭,所以非常兴奋,看着看着,双脚便情不自禁朝着火箭的身边移了过去。“同志们,请留步!”苏方人员急忙上前加以阻止,并婉言解释说:“按上级有关部门指示,今天的参观,没有接触火箭内部系统这项内容。”中国专家们只好退回原处。杨嘉墀后来讲,其实我们是想凑过去瞧瞧火箭的内部结构和控制系统到底长得是个什么样子。

参观结束,中国代表团回到饭店,兴奋之余又多少生出一些失落。此次苏联之行,考察期限眼看将尽,却连卫星的影子还没见着。怎么办?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亟待腾飞,火热的“大跃进”年代需要卫星,若就此打道回府,怎么交代?最后中国专家们一致商定,通过大使馆向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情况,要求给代表团再扩充一些新的考察内容;同时,赵九章又找到安德烈先生,希望能尽快安排一

次考察卫星和发射场的活动。

但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苏方没有明确回音。而这时的中国代表团,并不知道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从苏方工作人员那闪烁其词的谈话内容和躲躲闪闪的眼神中,他们又分明感到,这次想看“老大哥”的卫星和发射场,看来是不可能了。很快,苏联有关部门向中国大使馆作了正式答复: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赴苏考察,不便安排卫星研制和发射场区等考察内容,希望中方给予谅解。

为期七十天的考察转眼即逝。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几位苏联专家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中国五位专家共进晚宴。这是一顿充满了温情与真诚的晚宴。迷人的吊灯,飘香的伏特加酒,还有满桌子各种丰盛可口的俄罗斯风味食品;再加上几位苏联朋友所在的研究所以中国都是对口协作单位,他们曾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与赵九章、杨嘉墀等人都有较深的友情,所以在这离别之夜,中苏专家们欢聚一堂,开怀叙旧,晚宴便有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情调。

不过,几杯酒下肚之后,中国专家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此次考察的遗憾之情。苏联专家们对此心中有数,却尽量避开这一敏感的话题。他们谈中国的长城、故宫,谈北京城里的甜酱、烤鸭、葫芦串,就是闭口不谈卫星、火箭。但晚宴行将结束之际,许是酒精的原因,苏联专家们还是谈到了卫星。他们对中国专家说:“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涉及技术领域外,还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据苏联的经验,建议中国代表团回国后,不要一开始就搞卫星发射,而应该从探空火箭搞起。这样会更现实一些,也更有把握一些。”

第二天,在淡淡的晨雾中,中国代表团带着几分满足也带着某种遗憾,登上了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飞机。临别时,中苏专家们相互握手、拥抱,彼此谁都不说什么,但谁都明白对方想说什么。

(本文节选自李鸣生《航天七部曲》之《走出地球村》,该书是第一也是迄今唯一一部书写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全过程的长篇纪实文学。)

阅苑有书

【结果程序却相当烦琐,必须证明自己就是自己,不禁让人想起“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故事。】

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里,读到叶永烈先生的一篇文章:“某某百科差错太多”,其实相同的感触极多,也早就想写一篇类似的小文了。

叶先生开篇明义第一句:每当我受邀讲座,我总要向对方说明一声:作者简介千万别引用某某百科。

对此我深有同感。在很多次讲座或做电视节目之前,我都会接到一些带有计划安排的邀约,其中无一例外都会貌似认真地附上嘉宾简历,而那些漏洞百出的资料,只要瞄一眼就知道扒自网络何处。

有时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事先向本人先核实一下呢?一般这种情况,嘉宾手里肯定会有自己更为准确的“官方版本”。

可往往在我声明之后,对方还是继续使用那个错误百出的版本,以致我不得不在讲座之前明确地告诉听众:某某百科里的资料基本上都是胡扯。

据说有人花钱会上百科,也许是出于某些商业需要。但也有很多词条都是网友自发编纂的,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叶先生的情况显然也是这样。网友的好意我们心领,但资料错漏在所难免,毕竟每个人都是瞎子摸象般地拼凑自己了解的那部分资料,有些叙述即便反映的事件本身真实,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时间和条件限定,也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随便举个例子——

说我“专职:杂志科幻专栏编辑,漓江出版社《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选集》主编”——“这‘年度编辑’能是个职业吗?何况那只是个阶段性行为,现在我并没有给任何杂志做‘专栏编辑’;而图书‘主编’就更

不是个职业了,而且所描述的图书系列也不准确。编写此条者,显然不了解报刊与出版行业。

类似的错误比比皆是,惨不忍睹,不胜枚举,恕不赘述。

这些错误,自发编写的网民犯了情有可原,但至少相关的管理者不应缺席,应该想出更好的办法。然而,情况绝非那么简单。

开始看到这些错误,我一笑置之;后来被人屡屡引用,我也只是一一纠正;再后来引用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才想到要去修订。但真正修订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我听说有朋友试图这样做,结果程序却相当烦琐,必须证明自己就是自己,不禁让人想起“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故事。所以我也懒得去改,它愿意错就继续错下去吧。既然古人可以“大隐隐于市”甚至“大隐隐于朝”,我们也不妨“大隐隐于某”甚至“大隐隐于网”。

也许相关的管理者会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你真的是本人,所以必须核实,只是有许多麻烦云云。可问题是,简化程序方便用户应该是你们的义务,做不好可以不做,假如实在要做的话,就不妨做好一点,这点要求并不过分。

再说一下各种活动的组织者,或者报刊的编辑,不要动辄就以网上的资料为准,网络资料便捷是便捷,但却未必真实准确,就算参考也要找靠谱的网站,哪怕先搜一下再网下联系,哪怕多搜几处相互印证,其实最好还是先找到本人核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

不是喜欢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吗?同样的,“没有热心引用就没有谬误传播”。

书话岁月

堂吉诃德与阿Q

■金涛

【作者认为,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是最早接触到塞万提斯这部作品的中国人。】

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卷,是1605年问世的。第二卷发表于10年后,即1615年。鲁迅的不朽著作《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虽然这两部著作问世时间隔了300多年,又出自相隔万里的不同国家,然而仔细读来,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鲁迅笔下的阿Q,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

堂吉诃德与阿Q,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堂吉诃德是一位破落的乡绅,“他这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虽说家境破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家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管家婆……还有一个能下地也能上街的小伙子,替他套马除草”。堂吉诃德痴迷于骑士小说,“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照办……”(见杨绛译《堂吉诃德》)。

至于鲁迅笔下的阿Q,可就有点寒酸了,“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工作略长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见《阿Q正传》)看来,按照流行已久的阶级论,堂吉诃德与阿Q不属于一个阶级,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这两个生动的、不朽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的遭遇、命运不同,但个性特征却有共同之处。比如堂吉诃德把风磨当作巨人,奋力向风磨挑战,以致手里的长矛折成两段,弄得人仰马翻;或者他把羊群当成军队,骑着马冲进羊群,举枪乱刺,于是忍无可忍的牧羊人不得不用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甩向这个疯子。他被打断肋骨,磕掉几颗牙齿,落荒而逃……“只给一次又一次受挫,堂吉诃德的愚蠢行为尽管给他带来伤痛,他仍然坚信这些都是魔鬼变的,“跟我作对的混蛋魔法师会这样变来变去的”。他甚至自鸣得意地说:“你瞧全世界还有比我勇敢的骑士吗?我既能猛冲,又能苦战,有本领把对手杀得马仰人翻……”

至于我们熟悉的阿Q,他的故事几乎无人不知,他是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卑微的小人物,没什么出息,也没本事,却又喜欢招惹是非,招猫逗狗,吃了苦头,却不长记性。

王癞胡赤着脚捉虱子,他跟王胡挑衅,骂人家“这毛虫!”

钱太爷的大儿子、戴假辫子的“假洋鬼子”远远地走来,阿Q低声骂道:“秃儿,驴……”

吴妈,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仆,看得起也在赵府打工的阿Q,与他聊天。不料,他竟然“对伊跪下了”,傻乎乎地说什么“我和你困觉”,闹得吴妈寻死寻活,等等,等等。

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

吃亏的时候多”,书中如是说。或是被王胡揪住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或者被假洋鬼子用手杖毒打一顿。他想和吴妈恋爱的结果更惨:用一斤重的红烛一对,香一封到赵府赔罪,在赵府干活的工钱一笔勾销,还把唯一的棉裤当了两大块钱,赔礼道歉了事。

不过,放心,阿Q每一次都会转败为胜,阿Q心里想:“妈妈的,儿子打老子,这是什么世道……”这么一想,也忘掉了一切屈辱和不甘,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难怪有人说,在堂吉诃德身上,可以随时看到阿Q精神;在阿Q身上,也可以随时看到堂吉诃德的影子。

由此可知,堂吉诃德与阿Q这两个不朽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个性的共同之处,最为突出的便是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不管遭到何等挫折,不管多大的失败,绝不正视现实,对错误矢口否认,照样自我吹嘘,自己安慰自己。这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吧。

堂吉诃德与阿Q个性特征的相似之处,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也就必然引出另一个问题,即鲁迅的《阿Q正传》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间有无什么关系?

于是,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书《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陈众议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4月),该书第三编第二章“塞万提斯”第五节,专辟一节阐述《唐吉诃德》的版本及在各国流播情形,其中也以不短篇幅介绍了在中国的译介。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1902-1909年),与二弟周作人热衷外国小说的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一集、二集(1909年)。

作者认为,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是最早接触到塞万提斯这部作品的中国人。周作人在一本《欧洲文学史》(1918年)的教材里,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此书“揭示人以往思想之难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则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也。”(见《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34页,1989年)。

由此得出结论:鲁迅创作的阿Q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阿Q的Q,既意味着脑壳上的一根辫子,也无意中透露了来自Quixote的第一个字母。而且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有堂吉诃德的影子,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它是更加中国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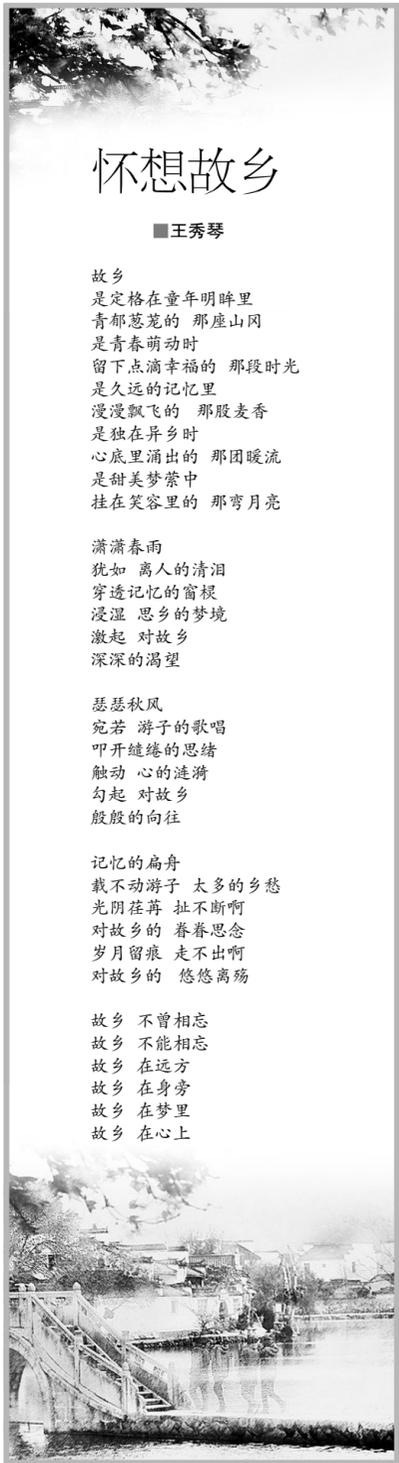
作者还列举了很多鲁迅与堂吉诃德有关的例子以及鲁迅对堂吉诃德的分析,足以证明鲁迅对这个人物的浓厚兴趣。

当然,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尚有待鲁迅研究专家的指正。

诚如杨绛先生所言:“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活人,不易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对堂吉诃德正也如此。这也许说明为什么《堂吉诃德》出版四百年了,还不断地有人在捉摸这部小说里的人物的性格。”

大隐隐于网

■星河



怀想故乡

■王秀琴

故乡
是定格在童年明眸里
青郁葱茏的那座山冈
是青春萌动时
留下点滴幸福的 那段时光
是久远的记忆里
漫漫飘飞的 那股麦香
是独在异乡时
心底里涌出的 那团暖流
是甜美梦萦中
挂在笑容里的 那弯月亮

潇潇春雨
犹如 离人的清泪
穿透记忆的窗棂
漫漫 思乡的梦想
激起 对故乡
深深的渴望

瑟瑟秋风
宛若 游子的歌唱
叩开 缠绕的思绪
触动 心的涟漪
勾起 对故乡
殷殷的向往

记忆的扁舟
载不动游子 太多的乡愁
光阴荏苒 扯不断啊
对故乡的 眷眷思念
岁月留痕 走不出啊
对故乡的 悠悠离殇

故乡 不曾相忘
故乡 不能相忘
故乡 在远方
故乡 在身边
故乡 在梦里
故乡 在心上



喋喋不休

周星驰的“自我意识”

■韩连庆

【而到了《美人鱼》,感觉周星驰也在拍摄“周星驰式的电影”了,那些搞笑的桥段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十几年前北京曾举办过一次“瑞典电影展”,我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大银幕上欣赏了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这部拍摄于1978年的电影是伯格曼晚年的作品,也是主演过《卡萨布兰卡》《美人计》和《真假公主》诸多经典影片的瑞典籍女演员英格丽·褒曼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伯格曼的电影是典型的“闷片”,看之前我已经作好充分的看不懂的思想准备,好在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探讨的是母女关系,只不过节奏有点慢,有大量的对话和独白,很像舞台剧。

按照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说法,《秋日奏鸣曲》是一部伯格曼的“自我意识”的电影,它的失败是因为伯格曼在拍摄“伯格曼式的电影”。换句话说,伯格曼的创造性已经失去了自发性,他开始模仿自己,即使他本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星驰的新作《美人鱼》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999年的《喜剧之王》既可视作周星驰的自传,也是他的总结性作品。2001年的《少林足球》他有了打入世界市场的雄心,选择了具有共通性的故事题材,把一些喜剧桥段放在动作和画面上而不是语言上。用周星驰的话来说:“我对使用俚语情有独钟,但是假如一些东西既能用动作表达,也能用对白表达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前者。在走向国际化的时候,最好尽可能减少电影和观众之间的障碍”。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走的还是这一路线。他在2008年的《长江七号》中开始试水科幻片,2016年的《美人鱼》又是这一路线的延伸。

周星驰的电影题材和风格发生转变之时,恰好也是《大话西游》借助网络重新被发现和奉为经典之时。与《逃学威龙》《鹿鼎记》中那些单纯的港式无厘头或插科打诨不同,《大话西游》被赋予了更多的深

意,可做多种诠释,尽管大部分人并不明了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些什么。周星驰也由此被奉为“喜剧大师”,尽管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自谦为“电影工作者”。

从《少林足球》开始,周星驰的电影混搭了奇幻或科幻,让我觉得很怪异,感觉没有他以前的电影好看,而到了《美人鱼》,感觉周星驰也在拍摄“周星驰式的电影”了,那些搞笑的桥段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看了前面的内容就知道后面的包袱是什么,很像在抄袭他以前的作品。凭借周星驰多年积累的人气,《美人鱼》的票房接近三十四亿,估计未来几年都很难被超越。

《美人鱼》另一个被夸赞的卖点是比较讨巧的环保题材。邓超扮演的唯利是图的地产大亨刘轩最后将全部资产捐赠给环保机构,可我们很容易忘记他的资产是靠强强联手哄抬股价和房价赚来的。虽然他说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的话,你挣再多的钱也是死路一条”,但正如张雨绮扮演的霸气女富豪李若兰指出的那样:“你就是为了那个女的”。真正的环保需要转变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是仅仅靠觉悟。

影片的最后,刘轩和林允扮演的珊珊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一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可鉴于珊珊是条“人鱼”,俩人又无法获得“幸福”。这以非常直观的方式例证了法国哲学家拉康的名言:“根本没有性关系。”拉康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这句备受争议的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人“性”的特殊之处在于无法从自身获得满足,它既是一种过度也是一种匮乏,是以匮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过剩。另一方面,按照齐泽克的解释,性爱“本质上乃是一种创伤——震撼、侵入以及潜在地令人作呕”。在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人人都行》中,理论物理学家鲍里斯离婚后邂逅了一位小女友,女友问他喜不喜欢做爱,鲍里斯说“不喜欢,“上一下跟台缝纫机似的”。这就导致性爱需要幻想。齐泽克认为,“对于性爱主体而言,只有当性爱对象进入主体的幻想框架之时,性爱才可以持续”。对于《美人鱼》中的刘轩来说,“美人鱼”只是他的幻想框架。